

學術論文

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灰色想像： 以日治中期(一九二〇到一九三七) 台灣政治社會文化反對運動為中心

The Gray Imagination of 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 People in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1920-1937): The Analysis of Political and Cultural Maneuvers against Colonial Domination

蔡仲禮 *Chung-li Tsai*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Doctoral Candidate of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日治中期(1920-1937)台灣反殖運動由早期的武力對位進入翻轉政治文化宰制之敘事脈絡，殖者和被殖者的身分想像由前期的二元對抗轉為模糊遊移、矛盾共生的不確定性主奴辯證關係，與後殖民理論家巴巴指涉的混雜、戲擬、居間之論述框架若合符節。回涉日治半甲子之歷史圖像，但凡主要行動者關係之置換交易、近代性與傳統性之越界意象、身分認同主體性之捍衛位移、乃至抗日團體之勃興頓挫，概以此一時期為蒿矢，相關

先行研究已有可觀成果。但究其實，出脫傳統史實之思辯，現有論旨殊多踵武自我與他者之間非此非比、亦此亦彼的敘事織品，呈現一種不確定性的灰色混雜情境。惟此種情境再現符碼之本質為何？迄今仍缺乏多維度的詮釋架構。如何從這旁逸曼衍的混雜性中歸納其本真性，厥為本文的重要發想。進言之，本文問題意識在於：如何在現有混雜性之核心命題上侵越門檻，去推曉其灰色光譜與位域？其本體基礎及形構途徑為何？思辯層次有無透過工具理性加以解釋的常則？本文擬透過結構主義與後殖民主義載體，進想上述圓轉無定的混雜性得以比較不混雜的面貌再現，庶幾嘗試概念化這個差異性多語境，呈現另一種看見。

During the mid-term period of Japanese colonization in Taiwan (1920-1937), the anti-colonization activities moved from armed conflict to social and cultural maneuvers against political domination. Instead of an initial dual confront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lonist and the colonized peoples turned into an ambivalent and co-existing phenomenon, which cohered perfectly with the key concepts of hybridity, third space, in-between and ambivalence presented by critical theorist Homi Bhabha. Such terms describe the ways in which colonized peoples have resisted the power of the colonizer. At this time, many historical incidents including the role replacement of main actors, the crossed culture of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the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y of national identity, as well as the rise and fall of anti-colonist movements could often be witnessed. Looking into the 17-year rebellion history, the current academic discussion mostly centers on the hybridity and ambivalence of a gray colonial phenomenon developed by the ruler and the ruled. Yet there has been no research so far on what the true identity of this gray hybridity i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essay is to analyze the denotation and connotation of this hybridity by way of post-colonialism and structuralism theories.

關鍵字：後殖民主義、符號學、混雜性、第三空間、民族同化

Keywords: Post-colonialism, Semiotics, Hybridity, Third place, National
assimilation

壹、緒言

西元 1895 年甲午戰後，清廷割台作為歷史契機的時間點；西元 1945 年，中國對日抗戰勝利，依國際法台灣領土主權復歸中國。在國土失復的五十年間，身陷殖民地的台灣人民持續進行各種反抗異民族支配運動。學界一般將日治史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 1895 年乙未戰爭到 1915 年的西來庵事件，台人武裝抗日事件頻密，台灣總督府強力鎮壓，為殖者與被殖者涇渭分明之二元對抗時期，呼應後殖民大師薩依德(Edward Said)指涉的文化本質主義與二元對抗主義。第二階段跨幅涵蓋 1915 年至 1937 年，為安撫民情，台灣改由文官治理，奉行內地延長主義。¹ 斯時台灣民智漸開，以「東京台灣青年會」、「新民會」等留日學生團體為端緒，向統治者要求政經社會改革，包括籌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灣文化協會」、「民眾黨」、「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等右翼組織；左翼之「台灣新文化協會」、「台灣農民組合」、「台灣工友總聯盟」以及「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等；文化方面有台灣新文學運動、新舊文學論戰、白話文論戰、台灣話文論戰等新思潮運動，反殖運動正式進入翻轉政治文化宰制之敘事脈絡，殖者和被殖者的身分想像脫離前期的二元對抗，進入模糊遊移、矛盾共生的不確定性主奴辯證關係，與後殖民理論(Post-Colonialism)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指涉的混雜、戲擬、居間之論述框架若合符節。隨著日本侵華及二戰爆發，殖民地進入皇民化運動階段(1937 年至 1945 年)，統治者透過國民精神總動員、皇民奉公會等政策強迫內台合一，全面遏制台灣知識界的能動空間，台灣人之政治文化反抗運動轉趨沉寂。總結此一時期的殖民地上下關係，業由第一階段的二元對抗、第二階段的灰色時期進

¹ 內地延長主義為日治中期，由原敬首相推動在台灣所施行的一種統治政策。該政策主張將包括台灣在內的殖民地以「雖與內地有稍許不同，但視為內地的延伸，直接適用本國法律，將之做為本國領土來統治」。第一位文官總督田健治郎同時提出了「日台融合」、「一視同仁」等漸進的具體方針。

入一元高壓統治的第三階段，從後殖民理論座標來思考，似乎又回到帝國主義(Imperialism)前期的本質主義以及義大利哲學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揭櫫的文化霸權主義了。²

貳、問題意識

過去學界對前述三階段抵殖運動論述甚豐，尤其第二階段兩者複合多元、既對抗又合作的混雜性最受矚目，成就重層日治的豐富性。回涉日治半甲子之歷史圖像，但凡主要行動者關係之置換交易、近代性與傳統性之越界意象、身分認同主體性之捍衛位移、乃至抗日團體之勃興頓挫，概以此一時期為蒿矢，為台人抗日能動性最強、內涵最多元豐富之時期，國內外相關研究已有可觀成果。但究其實，出脫傳統史實之思辯，目前有關後殖民觀點之論旨殊多踵武自我與他者之間非此非比、亦此亦彼的敘事織品，呈現一種不確定性的灰色混雜情境。惟此種指涉結構再現符碼之本質為何？迄今仍缺乏多維度的詮釋架構。如何從這旁逸曼衍的混雜性中歸納其本真性，厥為本文的重要發想。進言之，本文問題意識在於：如何在現有日治中期台灣民族文化抵抗運動之混雜性論述基礎上侵越門檻，去推曉其灰色光譜與位域？其本體基礎及形構途徑為何？在變與不變、抵抗與屈從之思辯層次有無透過工具理性加以解釋的常則？後殖民學者 Roger Toumson 嘗言：「如果學界咸信混雜性將廣受討論，就必須發展出一套工具理性來解釋它令人困惑的模糊性」。³本文爰擬透過結構主義與後殖民主義載體，進想上述圓轉無定的混雜性得以比較不混雜的面貌再現，庶幾嘗

² 義大利新馬克思主義學者葛蘭西所提出的文化霸權主義指的是一個社會階層可以通過操縱社會文化，支配或統治整個多元文化社會；統治階級的世界觀會被強制作為唯一的社會規範，並被認為是有助於全社會的普遍有效的思想，但實際上只有統治階級受益。

³ Kraidy, Marwan, *Hybridity of the Cultural Logic of Globaliza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70.

試概念化這個差異性多語境，呈現另一種看見。

參、文獻探討

當探討日治中期歷史進程的混雜性，歷時 14 年共提出 15 次申請案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最富爭議性。請願者與日人折衝過程產生敵我意識混淆、主客易位之翻轉現象，日本學者小熊英二之論述相當深入。他指出台灣知識菁英兼具抗日、親日之微妙性格，一面抗爭，一面卻爭取身為「日本人」的權利；一面批評日語教育，又嘆假名識字率太低而提倡內台共學；在與歐美為敵時，高唱亞洲連帶論，敵視日人時，又與歐美產生親近性；請願者認為內地人是友，總督府為敵，凡此皆不啻自相矛盾。小熊英二認為林呈祿以肯定六三法乃基於特殊民情風俗之特別立法，來強調台灣設置特別代議機構的理由，殖民同化主義在此被轉化利用，成了論說在地人自治的依據。⁴

學者陳翠蓮在論述議會運動時提出對抗/合作、平等/特殊性、用文明反文明的視點，強調請願運動內部分裂，卻贏得內地日人的支持，敵我界線不明，說明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角色模糊遊移的灰色想像。⁵此外在解釋抵抗與屈從的概念時，陳翠蓮觀察到抵抗也可透過日常生活中不明顯的、邊緣的方式來達到翻轉效果，「故不能以過度簡化的抵抗/屈從二分法為準，將正面對抗以外的行動都視為協力……不能因抵抗姿態不鮮明就被簡化為屈從」，⁶頗有洞見。

教育的啟蒙與規訓是另一個交錯位移的重點，可從學者陳培豐與吳叡人的論述來檢證。陳培豐認為政治上國語是敵性語言，卻是用來汲取近代

⁴ 小熊英二，「異体同身」の夢—台湾自治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日本人〉の境界—沖繩、アイヲ、台湾、朝鮮植民地支配から復歸運動まで》(東京：新曜社，1998年)，頁 277-335。

⁵ 陳翠蓮，《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 1920~1950》(臺北市：遠流出版社，2008年)，頁 141-169。

⁶ 陳翠蓮，《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 1920~1950》(臺北市：遠流出版社，2008年)，頁 27。

文明的友性語言。他舉出明治時期台灣人以接受同化為抵抗和大正時期一面抵抗、一面接受，皆無法擺脫同化於文明與同化於民族的糾葛。蔡培火推動台灣首次我手寫我口運動，更是立足於日本近代語言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思考何為抵抗的問題，不在於是否接受國語教育，而在於究竟是傾向同化於民族或文明的態度、動機去看接受同化教育。國語、漢文的敵性、我性經常錯置，故抵抗/協力與其慣用語言無關。⁷吳叡人在論述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民族文化運動時指出：台灣人反同化，又思創造現代性，意在最小限度保存固有文化是主體的防衛，最大限度創造新文化是主體的建構，兩者結合構成台灣文化主體性的思考。日、漢文具曖昧性與親近性，攻擊他者的傳統，等於攻擊自己的傳統，此一詭論影射台、日互為他者，證成了東方殖民主義的曖昧性。⁸

學者陳建忠在反殖民戰線的文化批判中看到了體制內文化抗爭具反殖民與啟蒙雙重意義，指出殖者與被殖者均有光明與黑暗面，兩極之中看到白中之黑、黑中之白。台灣知識菁英既反對法，又過於依循法。國民性的養成，讓知識分子被織入絕對服從的殖民權力網絡，脫離一般大眾，無異殖民者同謀。⁹

有關同化與皇民化之混雜性論述，荊子馨在《成為「日本人」》一書中指出同化是一種多方包容的模糊政策，讓統治者維持一定程度的正當性，也給被統治者有重新表述的空間。帝國一方面厲行政經不平等，一方面高喊文化融合，藉由同化將被殖者塑造為國族主體與被殖民剝削的客體，亦即日治初期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提出的差別性同化。日、中、韓文化富親近性與曖昧性，被當成同一性整合進同化論述，難以分辨自我與他

⁷ 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臺北市：麥田出版社，2006年），頁320-384。

⁸ 吳叡人，〈福爾摩沙意識形態—試論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民族運動「民族文化」論述的形成(1919—1937)〉，《新史學》，第17卷第2期（2006年6月），頁127-21。

⁹ 陳建忠，〈反殖民戰線的內部批判—再探「賴和和台灣文化協會」〉，《台灣史料研究》，第19期（2002年），頁178-197。

者、認同與歧視。¹⁰

以上探討日治中期的混雜性蔚為後殖民主義研究之核心論述，唯一持相左意見者為學者姚人多，認為日本統治台灣是以知識事實為治理性，沒有模糊遊移的餘地。此一殖民知識是要尋找事實而非扭曲事實，日治時期的台灣人是被數字、事實、甚至被真理所統治，¹¹而這些量化的技術可與法國後結構主義理論家傅柯 (Michel Foucault) 的規訓權力和治理性作連結。¹²

大陸研究模糊數學與灰色系統的學者李群指出：模糊事物沒有絕對的界線，因各人心中界線不一，承認一定的主觀性是模糊性的一個特點。然而人們心目中的界線又形成一定的分佈與規律，因而它又是客觀的，模糊性正是這種主觀與客觀統一的反應。¹³

西方知名後殖民理論家包括 Homi Bhabha、Francois Lionnet、Paul Gilroy、Stuart Hall 等人俱指陳混雜性是一種對抗單一聲音、單一典律、單一思想、單一主體以及線性歷史的後殖民論述，強調史實性與共時性的協合脈動。¹⁴

總結學者對於日治中期台灣知識分子向殖民主爭取平權的過程，其結構看似二元對立，實則充滿矛盾共生、互為異同的混雜性，除了姚人多，這個特性幾乎是學者的宰製論述與權威符號。惟誠如作者在問題意識中指出的：這個混雜性的本質要素究竟為何？其上位意義與能指系統如何表記？

¹⁰ 荊子馨，〈同化與皇民化之間—從殖民計畫到帝國臣民〉，《成為「日本人」》，第三章（臺北市：麥田出版社，2006年），頁127-181。

¹¹ 姚人多，〈認識台灣-知識、權力與日本在台之殖民治理性〉，《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42期（2002年），頁119-182。

¹² 法國社會學家及哲學家傅柯在其知名著作「規訓與懲罰」中提出透過節制、追蹤、考核、建檔、獎懲、評鑑等手段強化個人與社會之工作倫理與道德價值，目標是消除所有不規則性，生產有用且馴服的主體。

¹³ 李群，《不確定性數學方法研究及其在社會科學中之運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頁20。

¹⁴ Prabhu, Anjali, *Hybridity: Limits, Transformations, Prospect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 p. 5.

其客觀性認識基礎的分佈與規律何在？作者希望在既有研究成果上重新思考定位，揭開灰色面紗來解構、重讀這個混雜性。

肆、理論與方法

一、後殖民主義

殖民主義的歷史可以溯源自 16 世紀前後的海權時代開始，不可否認，歐、美、日等大國崛起的歷史中，大都存在著血腥的殖民主義，對殖民地進行掠奪、控制進而摧毀其民族意識與傳統文化，將殖者與被殖者表記為自我/他者的二元論述語境，帝國宰制也成為殖民情境的權威符號。一次戰後殖民地獨立運動風起雲湧，惟新興國家仍然無法跳脫殖民主義之影響，昔日宗主國更繼續以非領土化方式控制舊有殖民地，隱指新殖民主義之實質內涵建構。為了出脫殖民主義與新殖民主義魅影的束縛，後殖民主義者提出反對本質主義與二元對立的論述框架，以破除西方幾世紀以來對東方的敘事壟斷。當代後殖民理論家以法農、薩依德、史畢華克、巴巴 4 人最富代表性，重點論述簡述如下：

(一)、在殖民主義與新殖民主義盛行的時空下，法國著名的非裔知識分子法農(Frantz Fanon)首先針對族裔認同與文化尋根運動提出不同的價值思考。透過兩本成名著作《黑皮膚、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¹⁵「地球上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¹⁶法農率爾提出殖民地人民應重視心靈上的解放與自由，而非一味追求表面上的獨立，誠為後殖民主義打破帝國主義長期以來對殖民地人民生活與心靈進行規訓與宰製的啟蒙思維。

(二)、薩依德於七十年代末期出版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論

¹⁵ 法農，《黑皮膚，白面具》(臺北市：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¹⁶ 法農，《大地上的受苦者》(臺北市：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

述形構以葛蘭西的文化霸權主義以及傅柯的權力與知識體系為基礎。他指出東方論述是西方幾世紀以來透過「西方優於東方」這個基本二元假設所創造出來的，是為了支配與宰制東方世界的一種西方霸權話語。¹⁷它在想像及現實世界中影響著殖民世界的思想、文化、社會、制度等各個層面。正如馬克思所說的「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再現與詮釋」。¹⁸薩伊德的論述成為後殖民主義的經典之作，影響了歐美國家對於東方研究的態度與取向。

(三)、史畢華克(Gayatri C. Spivak)出身第三世界同時深受西方教育薰陶的背景，使其理論呈現多元性及複雜性。其理論重心源出馬克斯主義、解構主義與女性主義。不同於薩伊德，她希望改寫殖民學術機構以及殖民地本土菁英所形塑的歷史成為被剝奪者的歷史。¹⁹概言之，非主流文化研究是其學術思維的核心，藉以重建邊緣主體瓦解中心主體。她善於運用西方的敘事策略來弱化西方的殖民霸權文化，為庶民(subalterns)發聲請命。其在 1983 年發表的論文「Can the subalterns speak?」為她在後殖民領域奠定了學術聲望，協助第三世界挑戰殖民者的權威。

(四)、霍米巴巴站在法農文化自覺與薩依德東西文化二元辯證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戲擬(mimicry)與混雜性(hybridity)的看法。他指出東、西文化存有互為異同、矛盾共生的曖昧關係，並非絕對的二元對立。巴巴提出的戲擬概念，指的是一種近似但又不完全一樣的模糊空間(almost the same, but not quite)，可以讓強弱雙方在矛盾與差異之間相互轉化滲透、選擇穿越，巴巴稱之為「第三空間」(third space)，也就是殖民與被殖民雙方賴以交流、協商以及轉譯的仲介空間。由於這種對話機制的再現，使代表

¹⁷ 陶東風，《後殖民主義》(臺北市：揚智文化，2000年)，頁75-90。

¹⁸ 薩依德，王志弘等譯，《東方主義》(臺北市：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頁1-28。

¹⁹ Young, Robert J.C., *Colonial Desire: Hybridity in Theory, Culture and Race*(London: Routledge, 1995), p. 162.

二元對抗的本真性與絕對性，為相互越界的多元混雜性所取代。²⁰

二、結構主義符號學

本文擬利用法國哲學家巴特(Roland Barthes)的符號學理論作為主要研究方法。巴特於 1964 年發表符號學基本原理來闡釋索緒爾的概念：符號(sign)=符指(signified)/符徵(signifier)。其在 1970 年出版的《S/Z》一書中，²¹指出斜線 / 代表著眾多二項式之間的聯繫共線，指涉兩個元素必有其異同處。巴特另提出五種敘事符碼的概念，包括闡釋符碼、行動符碼、義素符碼、象徵符碼與文化符碼，這些符碼貫穿文本成為一種網路和局域。其中巴特特別從文化符碼與象徵符碼的關係機制談到二項式的基本邏輯運作，強調文化符碼只是意識形態的碎片，然因每人的主觀性各有不同，因此往往會將具有固定性概念的外延(denotation)轉化為形式多元不定的內涵(connotation)，惟內涵的意表終要回歸至語境的鋪陳佈展，一面從文本中拉出對照性的徵象，另一方面則將日常言談轉變為嚴肅的法理論述，這時文化符碼的意識形態碎片已歸攏為系列性的徵象，亦即以不斷透過二項式運作的徵象符碼做為結構主義方法論的分身，用以指涉文本的多重性。²²

三、方法

本論文採用非實驗性的研究方法，主要為比較研究法與檔案分析法兩種。檔案分析法依賴尋找與主題有關的文件、資料、紀錄、官方及學術文本作為研究資料的來源，再就不同文本中針對本文討論之核心議題加以蒐集整理並進行交叉比對作成分析報告。本論文另利用結構主義符號學的二項式分析邏輯作為主要分析技術，以日治中期的灰色殖民情境為「羅各斯

²⁰ 生安鋒，《霍米巴巴的後殖民主義研究》(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 62-90。

²¹ 巴特，屠有祥譯，《S/Z》(臺北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²² 閻嘯平，《破裂的隱喻-研習電影符號學的策略遊戲-理論篇》(臺北市：伴三工作室，2010年)，頁 140-142。

中心」總結構，逐層向下聯繫起亞結構體系，再透過亞結構二項式上下左右離合聯繫逐級螺旋上升，向上歸進同一總結構，形成富有邏輯性的辯證文本。²³又本文以政治學理論為主要研究途徑，經由經驗觀察與概念分析對日治史相關文本進行推理思考，與傳統歷史學強調對第一手史實史料進行鑑別考證之研究取徑明顯不同，期從政治學較宏觀的理論視角對日治中期的知識議程進行多維度、廣視點的探討，建構學科互涉的綜合視野。再者，本文對於日治中期物事結構的認知，係作者透過理論載具歸納演繹的結果，非必然是史學研究強調的時人觀點與事態，謹先敘明。

伍、自我的亞結構二項式

日據 50 年作為殖民的實驗場，殖民雙方在推離與挪移的縫隙中建立交織可逆的社會形構。領台之後，從新附地究竟採取英式抑或法式殖民路線爭議開始，²⁴日本帝國面對總督府在憲法中之屬性問題、台灣舊慣文化之取捨問題、本土抗爭問題、及至萬國局勢對台灣殖民地之影響等，台日關係之複雜多變遠勝於西方殖民地。本文不擬針對相關歷史議題進行回顧，將緊扣日治中期 17 年殖者與被殖者之混雜關係做重點審視，並以此灰色殖民情境為論述主軸，透過結構主義二律背反的分析常則逐層剖析其外延與內涵意義。

依據學者對於日治中期殖民關係的混雜性推論，似可以灰色殖民情境(即混雜性)為本篇論文之總結構，再以亞結構二項式傘狀分裂模式向下裂解這個混雜性的分層結構與意涵。在灰色殖民情境的敘事中，台灣人受迫高壓統治，統治者亦深受殖民地文化的反向影響及挑戰，一如印度後殖民大師 Ashis Nandy 所述除了被迫者，壓迫者其實也是自己壓迫政策下的受

²³ 閻嘯平，〈尋找國際關係的結構圖〉，《政治科學論叢》，第 38 期(2008 年)，頁 1-33。

²⁴ 伊藤桃子，〈日本明治政府司法省顧問盧朋的殖民地統治構思：以遼東、台灣統治政策論為中心〉，《大仁學報》，第 39 期 (2011 年)，頁 35-63。

受害者。²⁵因此，從灰色情境的總結構下，可以往下分析得到第一組亞結構二項式：自我/他者。歷經二十五年的異族統治，台灣人的漢民族文化主體性並沒有因此而喪失，相對於統治者視殖民地人民為遲到、落後、不文明、次等的他者，從殖民地在地觀點，因戰爭勝利入主台政者，才是真正的他者，證成了現象學中自我/他者主客易位、互為主體的辯證性。

從自我項下可引出下一組二項式：菁英/大眾。析理日治中期的台灣反抗運動，身為主要能動者的菁英份子可略分成三類：第一類為海外留學生，如大陸留學生張我軍、謝雪紅等，創設「啟發會」、「新民會」、「東京台灣青年會」的留日學生蔡培火、林呈祿、葉榮鐘、蔡式毅、連溫卿等。次為傳統士紳，他們或仕隱以詩文自娛，部分如辜顯榮、林熊徵等成為日本人的協力者。²⁶第三類為富有本土意識之文人如賴和、黃石輝、郭秋生、黃得時、王詩朗、楊逵等，透過文學創作與台灣漢文之保存來捍衛台灣之文化主體性。諷刺的是，代表近代性的知識菁英初以拯救台灣民眾脫離異國文化桎梏為志，但自錮於陳義過高，創新話語與理念無法在基層紮根，菁英份子最後成了孤立的社群，甚且被目為統治者推動近代化的同路人，突顯出菁英/大眾這組二項式中央與邊緣的模糊性。

循著菁英追求的理念軌跡和抵殖運動光譜，可往下經略出另一組重要的二項式：抵抗/屈從。依據學者 Shalini Puri 對於抵抗與反對的字義說明：「抵抗是伴隨著隱藏式的反對，反對是公然的抵抗」(Resistance entails covert opposition, whilst opposition is overt resistance)，²⁷因此抵抗的隱藏性以及偽裝特質，可以帶來語意上與政治上更大的彈性與模糊性，讓受迫者有更多迴旋轉折的空間。從 1920 年代開始，台人抗日進入政治及社會運

²⁵ Nandy, Ashis, *The Intimate Enemy: 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XV.

²⁶ 吳文星，〈日據初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肆應與變動〉，《歷史學報》，第 15 期 (1987 年 6 月)，頁 285-349。

²⁷ Puri, Shalini, *The Caribbean Postcolonia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p. 107-108。

動抗爭階段。林獻堂等人發起「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與「台灣文化協會」兩條主要抗爭路線，蔚為日治史上最能彰顯台灣主體性的政治社團與活動，是台灣人意識覺醒與文化重建的開始。²⁸它如「台灣農民組合」、「台灣工友總聯盟」、「台灣共產黨」等社團在抗日史上亦容忍並存，扮演相輔相成的角色。回到混雜性的討論，我們看到台灣人在日治中期的抗詰過程充滿了邏輯悖論。留日菁英擷取日本大正民主精神，學習西方的自由平等觀念，同時以從殖民者學習到的近代思想為武器回頭控訴殖民者施行於殖民地之不公不義。回看 1906 年公佈的六三法，以台灣殖民地治理之特殊性，故適用特別立法，殖民地直屬帝國天皇，另授予台灣總督專責行政立法之權。正因為這個由殖民母國為殖民地統治所想定的特殊性，隨後被台灣民族運動者襲取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在語文方面，時人一方面抗拒使用日文，一方面又要求全面普及國語教育，這種一面抵抗、一面接受的兩面策略，實乃指涉知識分子內心的邊緣化臨界狀態。他們學習明治知識與國民性涵養，並不代表就成為日本人，²⁹相反地乃意在破除不平等，所以接受日式教育，在統治者設定的框架中吸收養分、成長茁壯，但在世俗眼光中卻與屈從或暗合協力之意象貼近。回到歷史現場，誠如傅柯所言知識即權力，如不藉由向殖民者學習來的近代知識載具何能翻轉殖民桎梏？如此說來不能越界、二元對立的兩極鏡像不能成立。易言之，抵抗就是屈從、屈從就是抵抗，應是這種流動與翻轉的編碼與製造。

就抵抗的實質內涵來裂解，可得到下列一組二項式：近代性/傳統性。從溯源意義看，台灣知識分子追求的近代性，與 20 世紀初期一系列國際自由民主解放運動關係密切。從 1912 年民國肇建、大正民主在日本引領風潮，1917 年俄國十月革命，1918 年第三世界民族自決運動勃興，1919

²⁸ 黃頌顯，〈1920 年代臺灣文化協會成立背景因素之分析〉，《明道日本語教育》，第 2 期（2008 年 7 月），頁 237-274。

²⁹ 藍弘嶽，〈「明治知識」與殖民地臺灣政治：「國民性」論述與 1920 年代前的同化政策〉，《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88 期（2015 年 6 月），頁 151-203。

年中國的五四運動以及韓國的三一運動，均給台灣民族主義運動者帶來自覺、啟發、願景與想像。雖然接受的是日本從歐美沿襲而來的二手近代化知識，台灣精英卻不必然以日本為師。在批評歐美殖民霸權時，強調大東亞連帶主義，凸顯與日本的地理文化親近性。在反抗日本的殖民霸權時，則逕以歐美學術思想制度為尊。以第一代歐美帝國殖民主義來反對其所由出的第二代東亞帝國殖民主義，可見新興知識分子追求近代性的過程是透過遊移迂迴的取徑來突顯台灣的主體性。回到傳統性討論項下，台灣精英除了積極向總督府爭取內、台政治經濟平權，文化上則強調維護台灣舊慣與傳統的重要性，此與日人冀望經由同化政策達到民族文化統一、政治經濟差異化的企圖大相逕庭。這種文化與民族認同的不安與焦慮，正是殖民地人民失根飄移的具體圖像。

而追求近代性過程，可以區分為兩條主要路線，一是使用語文的爭議，二是抵殖運動的路線之爭，歸結為下列二項式：語文/路線。日治中期台灣文化主體性之爭有很大一部分與語文有關。語文項下又可區分為國語/漢語之二項式。國語(日文)的普遍化是日治中期殖民者推動同化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日本殖民學者矢內原忠雄曾說「國語教育」的目的有三：一為交談的工具，二為文化發達的手段，三為同化的武器。³⁰從早期一定程度的尊重本地舊慣語言文化、到中期逐漸刪減公、小學校的漢文教育時數、減少報紙媒體漢文版面、及至晚期完全禁用漢文，日語教育的推廣一直是統治者遂行同化於民族的政治方案。台灣知識份子對於國語懷有愛恨交織的複雜情感。就政治層面言，使用日語是接受殖民者同化及喪失民族主體性的象徵，日語因此被當成一種敵性語言。但是傳統漢文因缺乏接觸近代性所需要的效率性與方便性，台灣知識菁英希望與世界潮流接軌，不得不援用具有近代性的國語，故從工具性的角度看，日文又變成一種友性

³⁰ 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臺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2002年)，頁180。

語言。³¹由此推斷，直接以語文的使用來評量使用者的政治光譜，從後殖民主義視角是難以成立的。在漢文項下，又可分出古典漢文/台灣話文+白話文一組二項式。古典漢文雖受儒家文化薰陶的台灣仕紳重視，但在思想日益開放、近代知識爆炸的新時代顯已不合時宜。五四以降，大陸留學生張我軍等引進白話文，宥於白話文與台灣話言文不一致，使得白話文之推廣受到侷限，雖然初始以打破貴族式的古典漢文為志，最後本身卻成了另一種貴族語言，無法成為台灣民族主義的話文主流。另一方面，為了治理方便，統治者不得不借用當時在內地已非主流話文、但在台灣仍受菁英仕紳普遍衍用的古典漢文作為與台人溝通的載具，這種文體回歸的現象也讓人有錯置的意象嘲諷。³²在台灣話文項下有蔡培火主張的「我手寫我口」台灣羅馬字運動。雖然運動本身功敗垂成，重要的是負笈日本的蔡培火所提倡的革命性語言改革運動，其理念仍植基於日本明治時代近代語言的改革精神，亦即著重語言的效率性、大眾性與便利性，同為利用他者文明反制他者的史證。

回看語文/路線二項式下的路線問題。日治中期的民族與文化反抗運動，可以分為左/右兩條路線。右翼路線代表組織如「啟發會」、「新民會」、「東京台灣青年會」、「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台灣文化協會」、「民眾黨」、「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等，透過「台灣青年」、「台灣」、「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等媒體載具向日人爭取民主與人權。另一方面，左派勢力包括初期寄生於「東京台灣青年會」的「台灣青年會社會科學研究部」、從「台灣文化協會」分裂出來的「台灣新文化協會」、晚期的民眾黨等，以及謝雪紅等於 1928 年在上海成立的台灣共產黨。社會運動方面簡吉、趙港等於 1924 年至 1934 年主導的「台灣農民組合」以及 1928 年由蔣渭水輔導成立的「台灣工友總聯盟」，在政治光譜上呈現中

³¹ 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臺北市：麥田出版社，2006年），頁320-384。

³² 陳培豐，〈日治時期臺灣漢文脈的漂遊與想像：帝國漢文、殖民地漢文、中國白話文、臺灣話文〉，《台灣史研究》，第15卷第4期（2008年12月），頁31-86。

間偏左。文化運動方面包括新舊文學論戰、白話文論戰、台灣話文論戰等言論向度，整體而言是採取中間溫和的批判性路線。離開原點來看，此一時期之反殖運動表面上一致對外，惟究其實，其內部難脫左右相互傾軋卻又相互依存、影響的本質。如上所述，最初留日學生團體中之左派團體「台灣青年會社會科學研究部」，即是從原生單位右翼的「東京台灣青年會」所衍生。他如 1921 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至 1927 年正式分裂並為左派「台灣新文化協會」所取代。而由「台灣文化協會」右翼份子所成立的「民眾黨」晚期亦步向左化，可見日治中期的右翼社團往往成為左翼團體孕育的溫床。1928 年台灣共產黨成立，刺激台灣知識分子的思考方式與運動路線，右翼社團受到左派激進路線的影響，更彰顯出其溫和、容易妥協與脆弱的本質，最終偏離初衷而向統治者屈服或靠攏，也是此一時期台灣左右反對路線彼此交錯混雜所共構的既破壞、又生成的混沌圖像。

小結：在混雜性的灰色殖民情境的總結構下，相對於他者，以台灣社群為中心的自我圖像，其內在意涵充滿了表顯與內抑的矛盾性。例如自我項下兩個最大集合菁英與大眾之間沒有交集又富重疊性，此從抵抗與屈從、追求近代性與堅守傳統性、以及使用語言與反抗路線之反覆交叉辯證，俱可看見這種缺乏交集卻又重層疊化的多元複合性，陳述徵引了日治中期時人在政治、社會、文化方面的反殖民運動是在充滿焦慮、矛盾、不確定、混雜的驅力下進行。我們藉著二項式的樹狀結構不斷向上推想，略可窺探最上層的灰色意象，也是本文試圖透過後殖民主義與結構主義進行解構與重讀的目的。

陸、他者的亞結構二項式

薩依德在「東方主義論述後紀」為「他者」作了如下註腳：「每一個文化的發展和維繫，都需要另一個不同的和自己競爭的他我(alter ego)。要

建構一個身分認同，過程涉及建構對立面和『他者』。上文指出自我非全然的自我，他者亦非百分之百的他者，以下繼續透過二項式檢驗，逐層觀察這個他者的混雜性。

從殖民地台灣人的觀點，日本人這個他者，可以區分成一組二項式：朋友/敵人。立足於民族主義，他者永遠是敵對的一方，但從後殖民主義既在內也在外的雙重視點解讀，他者可以是敵人，也可以是朋友，或是同時身為敵友的模糊情狀，以下先從朋友項下來分析。自日本政界耆老板垣退助成立同化會開始，借助內地有影響力的人道主義者及社會主義者對抗台灣總督府的高壓統治，幾乎是日治中期台灣民族文化反抗運動最富行動能量的資源形構。³³「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嘗獲日本各界人士之奧援，如企業界的海老名彈正、植村正久、內村鑑三、大山鬱夫；學術界的井柳太郎、泉哲、矢內原忠雄、山本美越乃、吉野作造等，政界大老如田川大吉郎、島田三郎等，以及左派的山川均、北一輝等，³⁴彼等站在人道立場對抗天皇直屬的殖民地當局，被台灣人目為同一陣線之朋友。但若將國家民族的最終利益納入考量，朋友又有截然不同的政治光譜與道德詮釋。如上述幾類日本友台人士的基本共識是：支持台灣有限度的自治，但須以日本國家終極利益為前提。此與自治運動「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目標迥異。因此，這個頂著朋友光環的他者本質上是帶有敵性的。另一方面，實質利益的重疊，也能誘發帶有敵性的他者向朋友的光譜靠攏。在台米輸日問題上，台灣農民與總督府站在同一陣線對抗日本內地農民與帝國議會的保護主義。所以一向被視為敵的總督府此時反而是帶有友性的，對立與一致殊難區分。

回到敵人項下，可以區分為總督府在日治中期全力推動的同化政策以

³³ 岡本真希子，〈殖民地人民政治參與過程之折衝與挫折：以台灣同化會為中心〉，《台灣文獻》，第 62 卷第 3 期（2011 年 9 月），頁 273-320。

³⁴ 伊藤幹彥，《日治時代後期台灣政治思想之研究：析論台灣抗日運動者的政治思想》（臺北市：鴻儒堂，2005 年），頁 56-71。

及台人的反同化運動，因此推至下一組二項式：同化/反同化。部分學者指出日本人的同化政策就是反同化政策。後藤新平推動生物學政治與舊慣立法，³⁵提出差別即平等、同化即是差別的折衷論述，³⁶其實是以「同化」來否定「同化」的「同化」理論。³⁷後藤堅信過度教育殖民地人民不好，日人引進近代性價值卻又刻意貶抑這個價值在殖民地的實踐，足見同化政策本身充滿了偽妄與混雜。然而因為教育不足，台灣富家子弟紛紛出洋深造，有識者亦為台人在教育上受到歧視挑戰總督府，迫使統治者不得不正視台灣教育水準的提升。而台人教育水準提升，象徵向日本人爭取政治經濟文化平權的目標益為靠近。這種互為因果、以接受為抵抗的同化與反同化論述，正是本文題綱灰色殖民情境的表顯界說。

繼續觀察本組二項式的另一端「同化」。日治中期的同化政策，在政治與經濟權利上採取不平等待遇，台人就業無法與內地人公平競爭，缺乏公平參政權利，在保甲與治警制度下人民生活遭到監控，台灣物資被竊取，農民血汗遭受無情剝削，反映出同化政策的愚民性。相反的在文化向度，優位者執行徹底的同化，希望台人棄漢就和為帝國效忠。循著這兩條截然不同的路線，在同化項下可得到下一組二項式：政經隔離/文化融合。在政治與經濟權利上採取差別待遇，在文化上追求一致是日人理台的意底牢結，貫穿 50 年治程而未稍葺。相反的，台灣反對運動者爭取的是政治上真正的平等、民主與尊嚴，經濟上不受帝國主義盤剝壓榨，但在文化及民族認同問題上採取不同化於異族、堅持差異來消除中心定義下的差異立場，可見雙方在同化問題上有結構性的殊異認知。在文化融合項下可歸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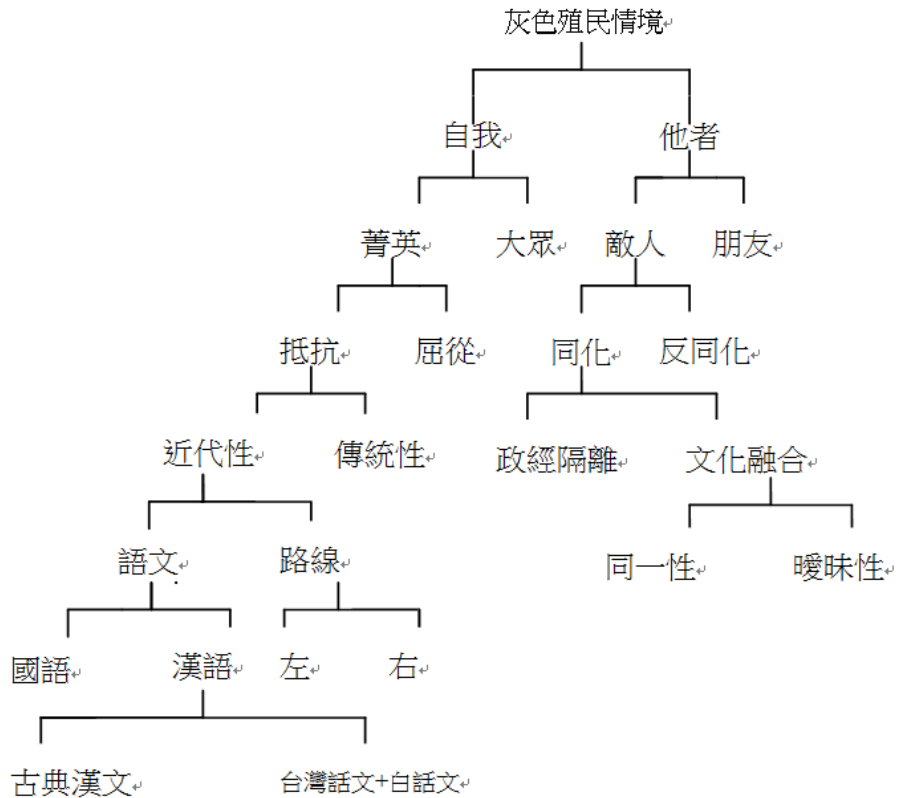
³⁵ 張隆志，〈從「舊慣」到「民俗」：日本近代知識生產與殖民地臺灣的文化政治〉，《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 2 期(2006 年)，頁 33-58。

³⁶ 根據日據初期台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生物學原理」理論，人生而不平等是自然的，同化只是實現「一視同仁」的一種約定，在所謂的「他日」的將來，可能會在台灣實施和內地一樣的統治。這種詭論賦予當時殖民政府實施差別統治的正當性，也是同化即是差別的折衷論述。

³⁷ 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臺北市：麥田出版社，2006 年)，頁 103-155。

成下一組二項式：同一性/曖昧性。回到歷史梗脈，中國、日本、韓國數千年來共同體承儒家思想的沐養教化，在文化內涵上有其同一性與共源結構。然而正因這種同源結構衍生出來的曖昧性，日本人與漢民族台灣人的界線被刻意模糊化，給予帝國主義者不當操控的機會。進言之，這種文化曖昧性為東方殖民經驗獨有的現象，自我與他者的界線在文化共同體的想像中被調整置換。基於上述，可以推論在割據地下進行反抗運動的台灣人民抗拒說寫日文、拒絕日本文化思想信仰，但正因兩國文化同根共源，否認大和文化，事實上也等於否認自己，這種文化底層的雙重外在性(double exteriority)，³⁸恐怕是當初殖民地台灣人民未曾深思的問題，也是本文討論後殖民模糊性的中心議題。

³⁸ 源出魏斯(Timothy Weiss)評論奈波爾(V. S. Naipaul)的流亡藝術作品時指出：在自我與他者之間，流亡者可以處於「雙重外在性」的特殊位域，他們屬於兩種不同文化，但又不認同其中的任何一種。流亡者可以越過邊界進行跨文化對話，以凸顯自己的獨特性並保持與他者的聯結。



圖一：灰色殖民情境的二項式符指結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小結：根據以上分析，在這個他者的定義下有敵有友，友中有敵，敵中有友，因此兩者間之共相殊相是重疊而充滿混雜性的。日治中期的同化政策是討論這個模糊性的核心議題，而文化主體性的辯異又是同化政策的論述焦點。文化融合的同一性/曖昧性協助我們思索後殖民主義的中心議題--文化解殖、逆思與重寫。誠如薩依德在「東方論述導引」所說：

東方論述呼籲建立新的思考途徑，以便我們理解世代以來引發敵對、戰爭和帝國操控的分隔和衝突。後殖民研究最引人興趣的發展是

重讀文化著述的典律，重新審視它們的假設，期超越套牢在它們身上令人窒息的二元對立辯證。

柒、灰色混雜性意旨結構表現

經由上述討論，從日治中期混雜的灰色殖民情境可以下推十二組亞結構二項式，包括其中兩個最大的集合：自我/他者。在自我項目下發展出菁英/大眾、抵抗/屈從、近代性/傳統性、語文/路線、國語/漢語、古典漢文/台灣話文+白話文、左翼路線/右翼路線等七組子項目。在他者項下推想出敵人/朋友、同化/反同化、政經隔離/文化融合、同一性/曖昧性等四組子項目。為了瞭解這些二項式上層的概念化符指，本文將利用符號學理論進加闡釋。

根據索緒爾與巴特對於符號的定義：符號=符指/符徵，符徵代表的是形聲表記，符指為這個形聲所隱含的上層概念。為求得混雜性之符指，首先必須以上述十二組二項式為符徵。以自我/他者為例，可以推導出兩者間最大通約性的符指概念是複合/多重。依此類推，從自我項下之各組二項式獲得符旨/符徵關係如下(括號內為符旨)：菁英/大眾(中央/邊緣)、抵抗/屈從(翻轉/流動)、近代性/傳統性(文明/落後)、語文/路線(新/舊)、國語/漢語(便利性/保守性)、漢文/台灣話文+白話文(守成/創新)、左翼路線/右翼路線(破壞/生成)。他者項下包括敵人/朋友(對立/一致)、同化/反同化(差別/平等)、政經隔離/文化融合(歧視/認同)、同一性/曖昧性(互賴/滲透)。

現反過來將這十二組意旨分為底層、中層、高層三個意義層次，逐級向上推論這個灰色混雜性的直觀本質。底層包含中央/邊緣、文明/落後、新/舊、便利性/保守性、守成/創新、破壞/生成、對立/一致、差別/平等、歧視/認同等九組意旨，這九組意旨與事實接近卻又不完全脛合事實，看似兩

鮮明對立的意象，實則更似「無家化」(unhomely)的變異結構。³⁹諸如國語與漢語的界線不明、左派右派路線的相互傾軋合作、精英與大眾角色互置、同化與反同化之意象重疊等，放在後殖民主義的光譜檢視，與巴巴所指涉的受迫者在絕望情境下向殖民主進行反抗所援引的戲擬策略一致。值得注意的是九組意旨中除了破壞/生成、中央/邊緣係以台人內部分歧作為敘事脈絡，其餘七組都以台日對抗為立論架構。惟察鑒台人抗日史，不分左右、激進保守、菁英非菁英，或許彼此理念路線南轅北轍，但容忍併存，反壓抑、反消音以及再書寫仍為最大共識。因此這九組意指所營現的底層意義是以合作為抵抗、以妥協為制衡、在混雜中發展適應、在變異中求生存的反抗共同體想像，也是這個混雜性的元層次概念。

從底層推進到三組中層意旨：翻轉/流動、複合/多重、互賴/滲透。與底層意旨不同的是，中層意指代表主客體身分的靈活選擇與穿越，一種灰色的殖民語境被烘襯成形。就翻轉/流動而言，象徵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利益糾葛不再鮮明對立，抗爭與屈從之界線轉趨模糊，抵抗不再是抵抗、屈從不再是屈從，蔚為一種流動不羈的情狀。複合/多重特指台灣人的身分認同問題。從天朝子民、棄地遺民轉為帝國臣民，最後徘徊在中國人、台灣人、日本人之身分肯認岔路，雙重他者化下的臺灣人無法在其中任何一方找到絕對性定於一端，成為日治時期台灣人無法跳脫的理性困境。互賴/滲透代表中日文化系出同源與模糊曖昧的臍帶關係，儒家傳統在日台殖民史上可以同時帶來正負能量，殖民者用它來矯飾同化政策的差別處遇，被殖民者因文化的同源性降低心防。正如一向關注文化雜種混交的巴巴認為「混雜是歷史性的運動，被當成偽裝的、鬥爭的、敵對的媒介作用，是文化落差的符號，是交戰規則的居間空間。」⁴⁰而中層意旨所觸及的三個意象：利益、身分認同與文化，適與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

³⁹ 無家化即巴巴所稱居間性(in-between)，一種同屬兩種世界又無法完全歸屬於其中的任何一種，涉及身分認同的兩難。

⁴⁰ 宋國誠，《後殖民論述—從法農到薩依德》(臺北市：擎松出版社，2003年)，頁8。

大師溫特(Alexandra Wendt)的理論架構一致。⁴¹依據溫特的說法，國家民族的行為主體依其主客觀利益進行自我身分再造，而身分也決定了國家自我認知與利益設定、進而形塑國家的行為。換句話說，一個國家民族的身分認同，是決定其利益及行為的關鍵因素。就日治史而言，選擇做為中國人、台灣人、日本人，或是選擇同時作為中國人、台灣人或三者皆是，不同的身分認同與選擇，對於台灣人究竟如何界定自我與他者、如何看待敵我問題、採取何種抵抗路線、使用何種語文，以及意識形態的推移擺盪，均具有外溢化的啟示與影響。

順著前述底層及中層意旨邏輯演繹至高層意旨，可以推論本文所試圖揭秘的殖民混雜性本質就是文化與身分認同問題。簡言之，也就是「我是誰」這個觸動民族心理機微的問題。Alberto Melucci 曾指涉主體身分涵蓋自由(freedoms)與自制(constraints)，而身分的臨界狀態可以被認知為對自制的體認以及兩者之間的交相作用。⁴²從以上符旨符徵的反覆辯證歸納這個身分認同問題得知：本文探討的每一組二項式皆存在一個反動、對抗、不穩定的因素。如果以 A 和 B 來代表這些二項式的兩端，則這個非本真、非絕對性、非靜止的因素就是 B，沒有 B，A 則缺乏存在意義。放在日治史的脈絡看，沒有台人奮袂而起、直接間接的抵殖抗爭運動，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歷史將被重新書寫，這個充滿混雜性的灰色殖民情境也將不復存在。進一步解讀身分認同問題，在二元辯證過程中，**抵抗、自我、漢語、反同化是主論述**；**屈從、他者、國語、同化才是子論述**，這就是混雜性的灰色殖民情境的真正意涵。因此，本文所討論的混雜性仍然有其本體結構，而這個本體結構正是建構在台灣人以抵抗帝國主義文化霸權與知識結構為

⁴¹ 根據溫特社會建構理論的觀點，國家俱有個體、類屬、角色、集體四種型態身分，各種身分根據行為主體對其意義的重要性排列成一等級結構，國家民族的行為主體依其主客觀利益進行自我身分再造，身分決定物質的意義，並決定國家利益的內涵，決定國家行為。

⁴² Tate, Shirley Anne, *Black Skins, Black Masks*(Vermont: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p. 92.

潛在意識所訴求的身分認同運動，一如史畢華克所言：「凡主體位置都是中心的，沒有非中心的主體」(There is no way the subject can be anything but centered.....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the decentered subject)，⁴³以及爭取巴巴所三致其意的第三折衝空間，落實反文化殖民的後殖民主義批判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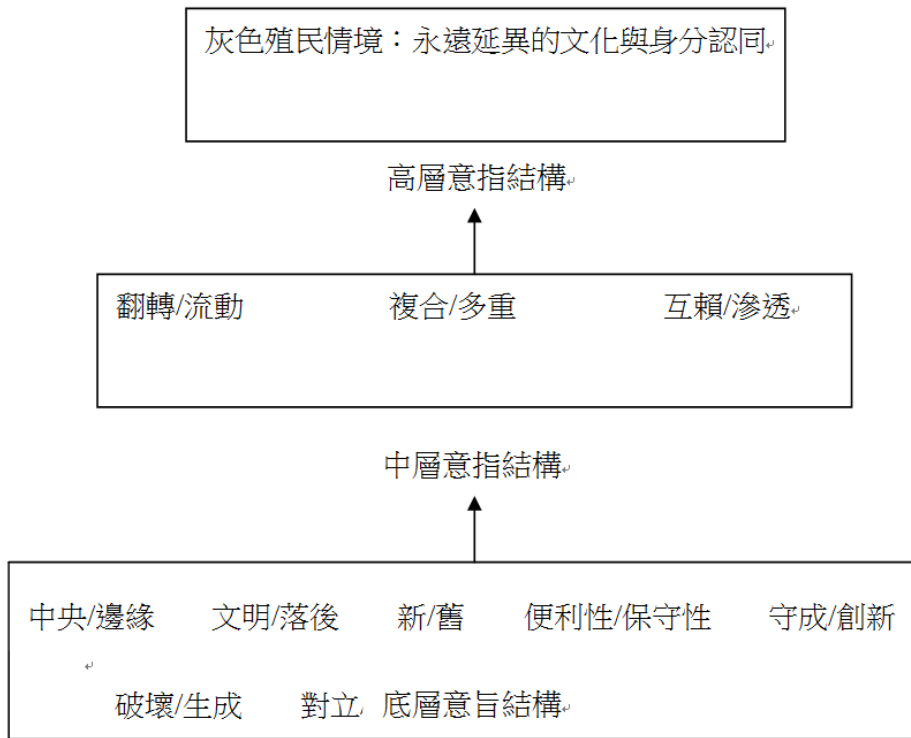


圖 2 灰色殖民情境的二項式意指結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捌、結論

本論文的主要目的，在針對後殖民主義學者揭櫫的殖民混雜性，回看

⁴³ Kawash, Samira, *Dislocating the Color Lin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15.

東方殖民主義的發動者日本帝國在其新領地台灣催生的灰色殖民情境，以及它所示指的混雜性歷史景深。雖然學界先進對於日治史的特殊混雜性提供了許多論證，然而這個混雜性的本真性為何？在抵抗與屈從之間處於何種位域？它在日治中期象徵何種特殊歷史梗脈？仍有諸多討論空間。本文試圖揭開灰色殖民面紗來剖析這個混雜性本質。作者透過結構主義一系列二項式組建一個龐大的邏輯結構，以灰色殖民情境的混雜性為總提綱，由此分成自我與他者兩大部分向下推演獲得十二組二項式，再依據符號學原理，以此十二組二項式為符徵，並將之概念化成十二組符指結構，分成底層、中層、高層逐層反向推論這個灰色殖民情境的混雜性本質。本文研究發現：日治中期殖者與被殖者之間的灰色混雜性是以台灣主體性之身分認同為中心，是有積極能動性的、可以妥協但絕不妥協、以他者身分攻擊他者、它必須經常創造間隙、屈從但永遠準備再出發。經由這樣的本質化詮釋，可以獲得以下結論：

一、誠如 Pnina Werbner 指稱：「以二元對立形勢出現的種族主義或族群主義，必將帶來改變、轉化、攻擊與尋求支持」。⁴⁴日治中期在強殖長驅直入的線性發展壓力下，漢文化與漢民族意識被拉擡至與優勢文化對位的高度，藉著逆反敘事瓦解中心主體，重建台灣民族意識的邊緣主體性，庶幾傳統性、在地性得與殖民性、現代性對話，產生了相互矛盾的混雜性命題。這個灰色殖民情境的混雜性指涉的中心議題--民族主體性的身分認同，與溫特所強調的國家身分認同可以決定國家的利益與行為是一致的。身分改變，利益隨之調整，而背後相關行動也必然隨之做出不同的因應。因此日治中期台灣社會菁英以及大眾究竟是以何種自我省視的身分認同去看待與對應日本的殖民統治，應該是整個殖民文本的關鍵所在。不同

⁴⁴ Werbner, Pnina, and Tariq, Modood, *Debating Cultural Hybridity*(London: Zed Books Ltd, 1997), p. 249.

的身分、不同的組合、產生不同的利益與行為，都是造成這個混雜性撕裂糾葛的主要因素。因此台日之間是敵人、對手抑或朋友，經過一次又一次的置換交易，形成一次次的越界，其流動主體性恐怕祇有以多元思維超越線性思維，從殖者與被殖者之間彼此對於主體身分錯綜複雜的認同情結之中去尋找。

二、從後殖民主義視點，這個混雜性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身上經常被反向解讀。為了有效統治新附地，日本帝國運用同化政策以及大東亞主義，諸如大川周明的「東西文明對抗統一史觀」、大隈重信的「文明調和論」的曖昧性與混雜性，作為區隔台灣次級文化的權力話語，台灣人在這種偏狹理性的框架下被剝削宰製，成為混雜性政策下的犧牲者。對殖民者而言，混雜性的蓄意鋪陳是威權治理的啟蒙與規訓，但對於被殖民者，卻是解構中心、復興邊緣的顛覆策略。正如史畢華克指涉的文化雜種與文化差異互為依存，是邊緣經驗的實存狀態。被殖民者藉由學習殖民者的近代文明反文明、藉由接受同化反同化、藉由屈服進行抵抗，從這過程中創造出來的混雜性，正是台灣人抵抗能量的形構基礎與養分，也是巴巴所強調的被殖民者經由戲擬與殖民者對峙周旋所建構出來的第三空間，使得統治者的殖民政策可以運轉卻又無法完全推行，而被殖民者也可以經由這個間隙避免失語進而對殖民者造成治理壓力。簡言之，殖民模糊性具有相互制約、互為條件的雙重性，有利殖民者的愚民政策，也可以擴大小敘事顛覆大敘事，用跨界主體建構去顛覆同一性，成為抵制二元對立的關鍵字。

三、十七世紀探險家 Samuel Collinst 嘗言：「文化本體性往往為反對所定義」(Cultural identities are often defined by opposition)。⁴⁵這個日治中期殖民混雜性的原初命題是民族主體身分認同的爭扎，其精神象徵指標則

⁴⁵ Burke, Peter, *Cultural Hybrid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9), p. 82.

是永不屈服的抵抗。檢視本文所列舉的混雜性二項式暨其相關符指，可以推導出缺乏抵抗的內涵建構，這個混雜性將失去其所憑藉的歷史語境。目前日治史學者論述有關抵抗與屈從之間的混雜性，多止於兩者間遊移互動、互為因果的辯證關係，似未針對兩者間的主客體性與主從關係作出分辨。本文強調：抵抗與屈從之間的權重是不同的。進言之，**抵抗是主論述，屈從是子論述**，沒有抵抗，就沒有屈從；有抵抗，才有屈從的踐行，有時是為抵抗而屈從，其外滲內翻過程遠比二元對抗益為顛覆。陳翠蓮指出：

戰爭時期的台灣人認同因時局移轉而有不同，且都有徘徊在日本、台灣、中國猶疑掙扎的經驗，即使在戰爭末期欲與日方合作，也是出於護衛台灣的初衷，不能因此就被簡化為日本人。其所作的因應與抉擇，應被放在時代的脈絡下被理解。⁴⁶

衡諸史實，這個抵抗精神所代表的差異論述橫亙整個 1920 年至 1937 年的台日殖民文本。因此可以說，「永遠延異」(forever differed)的抵抗是台人的主觀意志，⁴⁷本質是採取「對位—對抗」的姿態，屈從是為了抵抗所做的權宜。這個充滿混雜性的灰色殖民情境，在政治文化光譜上呈現漢和文化之間的拉鋸，然而實際面貌顯然是偏向捍衛台灣漢民族文化主體性的原鄉情感與時代共相。

責任編輯：賴郁璇

⁴⁶ 陳翠蓮，《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 1920~1950》(臺北市：遠流出版社，2008年)，頁 276-277。

⁴⁷ 延異(differance)是當代法國哲學家德里達(Jacques Derrida)解構主義的核心思想，意即「分延」與「差異」，是一個不斷產生差異的活動展現，也是產生差異的源頭。它賦予文本任何意義選擇的自由，導致那個所謂的終極意義永遠不可能存在與兌現，意即純粹本源的意義是不存在的，永遠處於「延異」之中而不可能重新在場。